

風雨流年

梁若虛 自述



风雨流年

——梁若尘自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1997年6月·广州



梁若尘 (1903—1990)

作者的话（集录）

1981年9月开始写本人半个世纪来的经历。写是为了留下走过的脚印。决定继续写下去。

——1984年9月

1980年打下设想，把本人参加五四运动、大革命运动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身历，写成个人回忆录，暂取名《面世》。但直到现在仍未正式动笔。仅在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专辑、全国政协出版的《辛亥革命》纪念专辑、中国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出版的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等，发表多篇回忆资料。这些历史资料也没有集中出版。

——1986年12月

1988年12月1日晨想起，把《面世》篇名（或

出版书名)改为《风雨流年》。

风雨 《诗·郑风》篇名。有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句。《诗序》云：“《风雨》，思君子也。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”。

流年 方干《送从兄郢》诗：“流年莫虚掷，华发不相容”。

——1988年12月

1989年5月25日晨，逢（本年）第4号热带强风，夜不能安睡，心情焦躁。起床想起，不宜对此生有悲戚。应立志于：

春蚕到老丝方尽，枯木逢春枝再生。

才能自强不息。书此自勉。

今天，是1990年5月1日，转抄以上的自言自励。下决心抓起笔写回忆（自传型）。不祈公开印成册子，只希能留下子孙辈珍存。

——1990年5月

目 录

一 报海钩沉

大革命时期汕头地区新闻战线的斗争	(1)
马来亚华侨报业杂忆(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三七)	(9)
抗日战争时期韶关《晨报》经历掠影	(18)
香港《愿望》周刊回忆	(22)
群蜂采酿无辞劳	
——忆中国新闻学院	(26)
写给相识和不相识的新闻界朋友	(29)
做一个新闻工作者	
——在暨南大学新闻系的讲演	(36)

二 沧海浪花

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	(47)
少年时期的回忆	(52)
童年接受的启迪	
白话文章的批语	
“丘九”的声威	
不能解除自己的武装(革命话旧)	(55)
广州起义的经历与见闻	(58)
牢门四进出 临缉两遁逃	(67)
本人失掉党的组织关系及其后的经历略述	(81)

六十多年来本人使用的名字	
——正名、假名和笔名	(84)
忆杨石魂同志	(86)
华侨四老人的爱国心声	(90)
方振武笑诘捧英官	(94)
非友又似友的奇遇	(97)

三 陈情抒怀

别善恶、辩是非的好妈妈	(102)
怀念阿婆 学习阿婆	(106)
诗九首	(116)
内心回响——答老友英浪	
回 味	
自 勉	
仲冬再探七星岩	
七十八岁诞辰有感——致老伴	
寄李成功、谢健弘二老友	
寄张云飞	
答星洲老报人何君	
晨 怀	

附 录

梁若尘年表	(125)
梁若尘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	(140)
梁若尘同志追悼会的悼词	(141)
梁若尘追悼会的新闻报道	(144)
编后记	(147)

大革命时期 汕头地区新闻战线的斗争

这里追述的是大革命时期(1925——1927年),广东汕头地区青年新闻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创立新闻机构,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,先后被摧残的往事。其中有潮梅通讯社、汕头国民通讯社和《岭东日日新闻》先后被封闭,工作人员有的被捕、被杀的经过;有因军事形势突变,汕头《红旗报》自行放弃的经过。这四个革命新闻机构,笔者都曾参加过工作。

当时笔者取名梁工甫(有时别写功甫)。现就回忆的片断写下。因事隔半个多世纪,一时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资料,当时共事的同人过半已离开人世,无可征询。全凭个人回忆,谈不到深广,近于浮光掠影。恕不避嫌,以作为治新闻事业史者参考。虔祈得到校正补缺。

潮梅通讯社的创立和被扼死

一九二五年,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到达汕头。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,由广州派出年轻的

党、团员黄光明、赵慕儒和詹展育到汕头市，筹设潮梅通讯社（下简称潮通社）。这是当时潮梅地区第一个公开活动的革命通讯社。笔者本人当时在《潮商公报》^①做外勤记者。一九二六年春，改任潮通社记者。当时，潮汕地区出版发行的报纸有多家，其中只有《岭东民国日报》是国民革命新政权建立后出版发行的进步报纸，其他在革命进军前就存在而仍继续出版的有《大岭东报》《潮商公报》《平报》《公言报》等。潮通社将每日采访得到的新闻油印发给当地报纸，对潮通社发的新闻稿，除《岭东民国日报》外，其他各报很少采用发表，即使采用，也是敷衍应景而已。

当时，何应钦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名义兼潮梅绥靖委员，周恩来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名义兼潮梅行政专员。潮梅地区尚处在军事时期，各县县长由行政专员委任。县长中多数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人士，如汕头市长张永福（老同盟会会员，新加坡归侨）、潮安县刘侯武、揭阳县陈卓凡、梅县县长江董琴等，都是开明之士（就我所知，当时各县县长中并无共产党员）。文教战线上的进步人士，如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春涛、金山中学校长杜国庠（又名杜守素）、王鼎新（当时任澄海中学校长或县长）等，都明言拥护国共合作，支持地方进步政治运动。但是，市、县的保守的、反动的势力却在何应钦怂恿下，有形无形地成为右派地方组织汕头新国民社^②的社会基础。新国民社的头头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名叫张凌云。此人和国民党右派组织，如“孙文主义学会”有勾

① 《潮商公报》社长杜宝珊，总编辑胡仲韬，为潮汕发行私人商、厂“七兑纸”而卖力的。支助者有郑铁如（中国银行汕头分行行长）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杜宝珊投靠日寇，成为民族罪人。

② 新国民社其外表为知识分子团体，宣告成立之日，邵力子穿着戎装到场讲话。起初，它的进步外衣蒙骗了一些人，不久，反动原形毕露，倒向“孙文主义学会”一边。1928年随着广东军阀内战而销声匿迹了。

搭，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支持该会的。于是，张凌云及其一手把持的新国民社，成为何应钦及其他反动势力、保守分子的代言人。在一次反英运动的群众大会上，张凌云以新国民社头目的身份登台讲话，肆无忌惮地指桑骂槐，公开向革命的、进步的地方政权横加攻击，尤其对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地方官吏，恶毒辱骂。与会群众大哗，挥拳捋袖，指斥张的诬蔑，张的发言未完即被赶下台。潮通社如实地将经过写成新闻稿，分送各报。第二天，有的报社把这篇新闻稿删改了重要情节而予以发表，但《岭东民国日报》则将原文照登了。《岭东民国日报》直属于中国国民党汕头特别委员会，社长李春涛^①，主要的编辑记者中有几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何应钦等见报后，大为恼火。于是用中国国民党汕头特别委员会领导人何应钦的名义，要该委员会秘书长廖伯鸿（中共党员）立刻召开委员会讨论，并指名要潮通社列席。因事出突然，我们正在想办法应付，彭湃同志知道后便派了一位姓肖的同志（中共党员）通知我们，要笔者以潮通社记者身份列席会议，并鼓励我们不要害怕，坚决和他们作斗争。当年我才二十三岁，从丰顺县山区进入城市工作刚刚两年，但在彭湃同志的鼓舞下，毅然出席了会议。

会议一开始，就看见何应钦的代表身着戎装、板着面孔，高傲而恼怒地坐在主席台上。接着，他凶狠地讲了几句胁迫的话之后，便追问潮通社的人到会没有，追问那条“破坏革命合作”的新闻是谁写的？我站起来回答新闻稿是我写的，说明完全是照录张凌云的原话和根据会场上群众对张的态度如

^① 李春涛，广东潮州人，早年留学日本。“五·四”运动时回到北京与彭湃、杜国庠、陈公博等十人组织“赭庐”，传播民主思想。汕头“四·一五”惨案前夕，被何应钦的爪牙诱捕杀害沉尸于汕头妈屿口海中。同时被害者还有廖伯鸿、梁德明两人。柯柏年（原名李春蕃）是他的胞弟。他生前写文章曾用“景山”笔名。

实地写出来的。我坐回原位后，那位代表指着我问是什么地方人，懂不懂潮州话（张凌云在群众大会上是用潮州方言演讲的）？我再次站起来，用潮州方言作了回答。会场上气氛缓和了下来，那位代表只好装腔作势地接连讲了一串言不由衷的话，指责潮通社发出这篇新闻稿是什么“破坏革命声誉”，责成报馆进行更正，还要潮通社向张凌云道歉。

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。第二天，潮通社接到通知，责成即日起停止发稿，宣布关闭潮通社。潮通社的工作人员，来自广州的黄光明、赵慕儒、詹展育返回广州去，我本人仍留在潮汕。

何应钦扼死潮梅通讯社后还虚晃一招，装作为了团结，几天后叫张凌云离开汕头去广州（张去广州约两个月又回到了汕头）。这是汕头革命新闻工作者在党的领导支持下，与何应钦所代表的右派势力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。

汕头国民通讯社的创办和被封闭

潮梅通讯社被何应钦为首的反动派使出拙劣的手法扼杀后，共产党地方领导为了传播革命的、正义的声音，为了揭露阴暗的、倒退的现象，由地委宣传部负责，指派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秘书方达史（中共党员）协助我筹办新的通讯社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头活动，争取到汕头商民协会、汕头总商会等单位中进步人士的资助，用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名义主办，于一九二六年仲夏正式成立了汕头国民通讯社，社址附设在“后援会”二楼。党指示我担任社长，参加新闻采访编辑的有朱宝岱、杨拱坦（二人为中共党员）、马赤人等。

国民通讯社开始发稿后，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嫉恨。新国民社的张凌云、陈述经等千方百计进行破坏。一方面通

过他们把持的《新国民日报》写文章冷嘲热讽，百般丑诋；一方面挑拨离间，要各报拒绝采用国民通讯社的新闻稿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，在革命洪流继续发展高涨中，国民通讯社也随之发展壮大，活跃在汕头地区的新闻战线上。有时还把新闻稿发给广州的《民国日报》《国民新闻》和《工人之路》等。

国民通讯社业务的顺利开展，敌人是不会甘心的。一天下午，何应钦的得力干将何玉书坐专用人力双轮车来到国民通讯社，刚坐下便嬉皮笑脸地对我说：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何总指挥（何应钦）要你以记者身份随军出发做宣传工作（指国民党革命第一军等由潮汕地区出发，取道福建、浙江，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），一同前往的有名记者丘誉。”（即丘与言。丘曾是汕头一家商办报纸的总编辑，就在国民革命军攻克潮汕之初，他写了好几篇破坏革命事业的文章，寄往上海，被革命机关查获，经周恩来同意，把他扣留审查。这次他们竟把丘从拘留所中调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派去前线。）我冷淡地对他说：“让我考虑一下。总指挥见爱，请代为致意。”

我向地委秘密办事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，并说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，认为他们意在“釜底抽薪”，搞垮国民通讯社。党（汇报时彭湃同志在场）指示我留下，另派徐琛、余哲贞夫妇和郭栋材三人（均系中共党员）随军出发。他们进福建后，留在闽西漳州、福州工作。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前一天，即1927年4月11日下午，徐琛夫妇被反动派逮捕，不久被杀害，郭栋材逃出。而当何军进入浙江，何玉书当上省主席时，那个所谓的“名记者”丘誉也当上了厅长。

我没应何之召，留在汕头。不久，何玉书突然又一次来到国民通讯社，开口便责问我：“为什么国民通讯社发出革命军杀死运输队员的谣言，送报纸发表？”并说何应钦从三河坝

(大埔县境内)来了专电,前方官兵对破坏军民合作的谣言很愤怒,要我马上去讲清楚。说毕不等我解释,便悻悻然下楼而去了。

何走后,我立即到农民运动办事处(是党的公开办事机关),找到党的几位负责同志汇报了情况。彭湃同志斩钉截铁地说:“你不要怕他,他们如敢逮捕你,党将组织万人大会支援国民通讯社,同时欢迎你回来。”何玉书后来知道我们不买他的帐,此事便不了了之。

原来,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向福建进军,共产党发动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志愿参加支援进军的运输队。其中有一队路经丰顺县隍隍附近时,有两个运输队员被借故打死,把尸首投入韩江。浮尸漂流到潮安县湘子桥下时,被船工捞起。通过有关方面反复调查,证实是遭军队打死的。国民通讯社便将此暴行写成新闻发送各报。《岭东民国日报》将全文刊出。何玉书、何辑伍(何应钦的同胞兄弟,当时任汕头市公安局长)等看此新闻后即来通讯社发难。

反动派对革命的新闻机构怀有刻骨仇恨。“四·一五”潮汕反革命事变中(即所谓清党),国民通讯社被封闭,编辑朱宝岱、记者杨拱坦和一位通讯员被捕。在“八一”南昌起义军开进潮汕的前几天,朱、杨被用浅水战舰押送往广州。同年11月间,当我奉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指派到黄埔军校任校报《黄埔潮》主编时,通过组织,取得黄琪翔军内的中共党员暗中支助,将朱、杨保领出来。三十年代朱病死于马来亚的大山脚学校校长任内;杨则隐居他家乡,于六十年代病死。那位通讯员(名字忆不起)在汕头得到业友的营救,侥幸获释在先。

《岭东日日新闻》从创刊到被封

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，国民革命阵营起了激烈的分化，革命与反动势力的斗争公开化，而且日见剧烈，广州地方如是，汕头及潮梅一带也如是。代表蒋介石的何应钦实力派，在蒋介石炮制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这一篡党篡军的阴谋实现后，于同年秋间，把一直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掌握的《岭东民国日报》的领导权夺去，交给投机分子方乃斌等。而原社长李春涛，编辑丁愿、李春蕃（均为中共党员）都被排挤退出该报。一时间，这张一直拥护国共合作的报纸，变成了反动势力（包括“民团”、“保卫团”）利益的代表，与新国民社、《新国民日报》此唱彼和，猖狂地反对、攻击革命运动。迫于形势，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筹办一张报纸。

同年冬，中共地下党组织指派我和肖师孟等筹办报纸。一九二七年春节前，对开张的《岭东日日新闻》正式出版了。我任该报发行人兼经理，担任主要编辑工作的有丁愿、李春蕃等。该报的经费来源，是通过进步群众团体分头征集。其中有汕头市商民协会古梦蒸，汕头市总商会爱国人士石子琴等支助。从一创刊，每日销数便为汕头地区各报之冠。它的言论和新闻，也使读者耳目一新。李春蕃以“虬英”笔名每天写杂文、短评等在报上发表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他曾写杂文讥讽被夺权的《岭东民国日报》不是“民国”报而是“民团”报，至使右派势力不满，方乃斌之流更是暴跳如雷。李春蕃又打蛇随棍上，另写了一篇短文，题为《团非国之误也》，使方乃斌等啼笑皆非，无可奈何。

在《岭东日日新闻》出版约三个月的时候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晨，反动军警包围捣毁了报馆。当时我奉汕头

地委（化名“先为”）指派，于四月十三日负临时通讯任务，由汕头经香港到广州向区党委递交密报。而临时代我处理报馆事务的巫丙熹（汕头书店经理）被反动派逮捕，于同年九月中旬惨遭杀害。我于四月十六日在香港候搭省港轮渡时，从当天的香港《华字日报》第一版刊出的电讯看到：汕头赤党分子杨石魂、梁工甫被捕。其实，杨石魂是汕头总工会的委员长，当时已经离开汕头多时；被捕的是汕头市总工会秘书丘璘同志。不知是记者采写新闻不确，还是捕人者别有诡意，发出这样可耻的报道。丘璘同志后来也被杀害了。

《红旗报》的不幸夭折

“八一”南昌起义军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到达汕头。革命委员会派蓝裕业、罗百良和我迅速筹办出版日报，取名《红旗报》。为了使工作能顺利开展，革命委员会派肖师孟捎来五百元港币作为筹办报纸的急用款项。经过两天时间的分头活动，采编、排版印刷车间的班子搭了起来，决定十月一日正式出创刊号。九月三十日午夜，正当创刊号大版即将上机开印的时候，突然得到党保卫员的通知，说明市区主力部队正在撤退，报纸出版工作立即放弃，工作人员转入地下，自行设法隐蔽。这突然的消息，使全体员工愕然。形势紧迫，只好忍痛割爱，不少员工还为之流下了眼泪，依依不舍地各自离开报社。

由此，汕头《红旗报》犹如一个新生娃娃，在即将呱呱坠地时夭折了。从此，汕头地区的新闻工作又暂时转入地下，以油印形式出版传播。

注：本文刊载《新闻研究资料》1984.1总23辑，《广东革命报刊研究》1987年10月第1辑。根据刊出稿印。

马来亚华侨报业杂忆

(一九二八—一九三七)

我是“广州起义”失败后逃亡到马来亚的。1927年12月26日晨踏上新加坡码头。从此，我以十个年头的青春（24—34岁），和千千万万的爱国华侨生活在一起。他们无分男女老幼，绝大多数是真心实意期望祖国能早日走上独立自强的光辉大道的。同时，他们也祈求居留地的繁荣安定。

我在马来亚的那十年（1928—1937年）间，参加华侨报纸、杂志工作的时间较长，间歇时间在华侨办的学校中作过校长、教师。回忆当年，感触良多。现仅就记忆所及，将那时马来亚华侨报刊的一些情况拉杂写下，供研究华侨新闻史者参考。

(一)

经过四个昼夜的海上颠簸，我首次踏上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码头，买了一份当天的新国民日报，看后颇为惊奇，为什么远在他邦的华文报纸，和几天前在香港看到的华文报纸，一式模样？报纸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者任情污蔑、攻击、咒

骂，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屠杀工人、青年、共产党员，不但加指责，反而大肆吹捧。几天后，才了解到：当地比较有影响的华文报纸有三家。新国民日报，是代表蒋介石的国民党的，发刊于辛亥革命时期，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况；总汇报，是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变法改革，而反对民主革命的，也发刊于辛亥革命时期；南洋商报，是陈嘉庚公司独资经营的，创刊于1923年。陈嘉庚先生曾向报馆工作人员讲过：南洋商报不能反对孙总理，对其他党派、人物，我都不计较。这三家报纸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，但对共产党及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，有反对或怀疑是它们的共通点。其后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及报纸主要人员的变动，情况又有变化。

各报的电讯，大都仰给于路透社，其他各国的通讯社电讯很少选用；新闻通讯报导，大都从香港的华文报纸上剪裁；地方新闻由各报的外勤记者采写，对经济的、社会的新闻比较重视。各报都有副刊，多用社外来稿，也有特约编写的专页。副刊内容，有常识性的、趣味性的，也间有带政治性倾向的。说它是带有“倾向”，是因为多属轻描淡写，态度不明朗，语言又吞吐的。各报每天都有社论（评论）泛谈国内政治问题的多一些，评论当地问题的可说是绝无仅有。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评论，人云亦云的居多，说不上战斗性，一般的是期望祖国早日安定富强。这是我初到新加坡时所见。

1928年3月，我到槟榔屿（通称槟城）住了一段时间。那里也有三家华文报纸：一是光华日报，二是槟城新报，这两家报纸均创刊于辛亥革命时期，政治背景类似于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和总汇报。三是南洋时报。性质略同于陈嘉庚公司以商办报，不同的是集股而不是独资经营。

这三家华文报纸，在内容、版面和评论方面，和新加坡的三家报纸没有重大区别。副刊方面，有个别副刊的政治性